

#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在现代国际阶级竞争中的角色之参考、论题、猜想、争论与历史观察

[美] 摇艾尔文·古德纳摇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美)古德纳著;

顾晓辉,蔡嵘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知识分子译丛)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ISBN 7-214-03104-3

I. 知... II. ①古...②顾...③蔡... III. ①知识分子-  
研究②阶级分析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776 号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Copyright © 1979 by Alvin Gouldn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字: 10-2001-077 号

书 名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著 者 [美]艾尔文·古德纳  
译 者 顾晓辉 蔡 嵘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04-3/D·491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目 录

引言 .....	
论题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足 .....	
论题 二 农民与先锋队 .....	
论题 三 有形的与无形的新阶级 .....	
论题 四 竞争的舞台 .....	
论题 五 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 .....	
论题 六 作为一个言语共同体的新阶级 .....	
论题 七 教育与新阶级的再生产 .....	
论题 八 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 .....	
论题 九 旧式专业官僚与新式职员知识分子 .....	
论题 十 革命的知识分子 .....	
论题 十一 人文的和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异化 .....	
论题 十二 异化再生产中的家庭 .....	
论题 十三 马克思主义的二难与先锋队组织 .....	
论题 十四 有缺陷的普遍阶级 .....	
论题 十五 政治语境 .....	
论题 十六 对一个垂死阶级的慰藉 .....	
跋 .....	
参考文献 .....	
注释 .....	
索引 .....	

## 鸣摇摇谢

1977年夏,我在华盛顿大学主持了一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国家人文学科赞助基金资助的。会上,我讨论了本书中叙述的有关新阶级的所有论题(略有修改)。我对下述与会并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的学者们表示感谢:安德鲁·阿拉托、罗德·坎普、理查德·科尔瓦德、科内利斯·迪斯科、杰弗里·福克斯、苏伦·古普塔、约瑟夫·希利、威尔·凯姆、哈利勒·纳赫利赫、约翰·诺伊迈尔、罗杰·纽科姆、爱德华·普赖斯。1977年秋天,在欧洲讲学期间,得以与萨格勒布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维也纳高等教育学院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同行们对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我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麦考利、朱迪·格林、珍妮特·沃克·古德纳对本书的帮助。本书中遗留的错漏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



站在其子女一边,共同进行反抗。由于父权制的衰落和母亲影响的增强,子女们对于自治的要求如今更难以受到压制,他们对于父权制的敌意和反叛也会更加公开化。相应地,父权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被强加、重塑到子女身上。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许多地方,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公共的、非教会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多阶级的教育上,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改革和拓展。这场改革和拓展不仅发生在高等专科学校、理工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教育中,也发生在较低层次的教育中。一方面,公立学校的高等教育成为大批造就新阶级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小学和中学教师人数的扩充也极大地增加了新阶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

作为教师,知识分子后来逐渐被定义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而不是拥护其学生及家长的阶级利益的人。作为教师,他们并不具有在子女身上重塑其父辈的价值观的义务。公立学校的教师取代了私人家庭教师。

结构上有所差别的新式教育体系越来越从家庭体系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这种价值观与他们家庭的价值观存在着分歧。原先通过家庭实现的青年人的社会化,如今则由一群半自治的教师群体从中促成。

日益发展的公共教育不但限制了家庭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国家对教育的作用。因而,公共教育体系对其学生而言,成为一种重要的世界化的影响,并随之相应地远离了地方主义的利益与价值观。

另外,新的学校体系为学生们彻底进行语言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这一转向使随意的言说方式转变成反思的言说方式。或者,(用巴塞尔·丰伯恩斯坦[~~拜恩州~~]的话说)从“有限的”语言学法则转向“详尽阐释的”语言学法则,转向一种话语的文化。在此种文化中,可以不根据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来断定其声明与主张的合理性。这一情况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它使所有以权威为依据的主张潜在地成为问题。

这种新的话语文化常常与基于日常生活的假设有所差别。它往往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即便它们与上层阶级相联系。这些由学校灌输的言语方式(相对地)也是与情景无关(泽那)的语言变体。一般说来,这种情景无关通过“传播革命”,尤其是通过印刷技术的发展进而得到提高。伴随着印刷材料的普及,知识分子可获得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如今日益可以从远方的人,从地理、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群体,甚至从死者那里获得。并且,他们也许因此与自身所处的当地环境产生巨大的分歧。他们也许会把地方精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与其他地区和时代所作的解释进行招人不满的对比。

随着公立学校的普及,读写能力也普及了;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其排他性与市场特权地位。而且,他们如今体味着一种地位上的不协调:即他们自视拥有的“高雅”文化层次,与他们获得的较低的尊重、名誉、收入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协调。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个技术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里,变得比技术知识分子更加处于边缘地位,更加受到冷落。新阶级的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最后,现代知识分子出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插曲是不断变化的革命组织形式。革命自身成了一种用“工具理性”去奉行的技术。革命组织从一个仪式的、受誓约约束的秘密社团演变为现代的“先锋”政党。为《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主义者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时候,革命组织正如它所暗示的那样,按计划进入了公众生活。《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这一组织诞生于“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则是“流亡者同盟”。后者是由在巴黎的德国移民组成的团体,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对上、下级成

员进行严格的区分,在加盟仪式上其成员要被蒙住双眼,使用暗号和口令,并通过誓约约束其成员。<sup>75</sup>然而,先锋队组织却把加盟非仪式化,同时,它既需要“秘密社团”的要素,也需要公开的政党的要素。在先锋队组织中,公开性指的是教义的公开可用性,而不是指组织或其成员资格被公开审查的可能性。此处,成为“公开的”就是需要这个组织摒弃仅被其中某个精英所理解的“秘密的教义”——正如巴枯宁(月第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精英专政学说一样。<sup>76</sup>现代先锋队组织最初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的解释。本书则明确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培养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而必须从知识分子发展的科学理论中来把握这种意识。<sup>77</sup>先锋队政党不仅表现出新阶级克服其政治局限性的努力,还表达了它进行现代化与成为精英的雄心。列宁对发展“职业的”革命者作为先锋队的核心的呼吁是一种修辞术,它带有一种对职业式生涯的心照不宣的承诺。这种生活吸引着新阶级的年轻成员去使革命“正常化”。

我将要回到并详尽阐述上面列出的某些决定性的事件。最重要的是,我试图构建出一个可以使新阶级有适当位置的参照系,给出理解新阶级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所必须做的研究工作——理论和经验——的一些标识。我并不认为新阶级似乎仅仅由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两者组成,以下的努力是朝着确认新阶级包括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论去做的。我的兴趣并非仅仅狭隘地局限于美国,它兼顾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集权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阶级,而不去争论或暗示任何更普遍的“一致性”的论题。我要提出的新阶级的一般理论所需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其一,一种关于它所特有的语言行为与话语文化的理论;其二,关于资本的一般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梁启超译)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梁启超译)将作为特殊的实例。

接下来的分析是基于一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学(这只能称之为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种“左派的”然而却并非是“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学。它之所以是左派黑格尔主义,在于它认为知识与知识体系在决定社会结果方面很重要。然而,它并不把这两者视为无形的永恒要素,而是将其视为特定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它一方面乐于相信知识是我们在人类社会重构方面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希望之一;另一方面,它也把我们的知识体系看成是体现局限性甚至是病状的历史形成的力量。

如同任何社会对象一样,新阶级可以依照它所拥有的价值和优点以及它所掌握的权力来定义。<sup>78</sup>依据大多数的文化规则,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善强恶弱的世界。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并使它正常化的诱惑力是难于抵抗的。而且,人们在新阶级的概念中看到它正在发挥着作用。因而,诺姆·乔姆斯基(梁启超译)视新阶级为愤世嫉俗的堕落,是他人虚弱、顺从的工具。相反,约翰·加尔布雷思(梁启超译)把技术知识分子看作是富有生产性的、和善的,并且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判断承受了正常化倾向的压力(尽管方向不同),并且按理应该受到怀疑。

与这种正常化倾向相反,一种左派黑格尔主义社会学把失调(梁启超译)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它不去假定善强恶弱。它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比如新阶级——且未来可能属于他们的人,并不总是更好的。况且,他们其实在道德上可能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几个可以区分的新阶级的概念:

援作为良性的技术官僚的新阶级,在这里,新阶级被看作一个新的历史精英,它已经以良性的方式对社会的制度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占据着牢固的地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与值得相信的。如,加尔布雷思<sup>79</sup>,贝尔(月第卷),伯尔(月第卷)和米恩斯(梁启超译)。<sup>80</sup>



阶级曾被(现在仍被)看作是这种未来的预兆一样。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将比计算机网络化寿命更长。与此同时,左派黑格尔主义社会学也坚持认为新阶级作为普遍阶级是深具缺陷的。更有甚者,新阶级不是某种统一的主体或天衣无缝的整体,它也具有自己的内在矛盾。它是一个在内部分裂为(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阶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这没有什么可庆贺的,我的观点是对新阶级的一种批判,我不把新阶级正在增长的权力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我把新阶级看作是在道德上模糊不清的,它体现着集体的利益,但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它也培养着自身的行会优势。

一个术语的注解,我把新阶级称为一个“阶级”,有些人会觉得惊愕(甚至恼怒)。他们会坚持认为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阶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比他们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我提醒他们,既然马克思主义很少正式地、含蓄地给“阶级”下定义,我也同样有自由不去使这件事成为一个学究式的问题。第二,就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对阶级的明晰的概念而言,它似乎认为阶级是由那些在生产方式上具有相同关系的人所组成的。我也以相同的方式提出,新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尤其是与我其后称之为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的关系,具有某些共同之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提醒那些反对我用“阶级”一词的人,《共产党宣言》采取的是一种并非不同的用法。它认为这一术语可以恰当地运用于诸如奴隶、农奴、雇工或资产阶级等历史上不同的集团。而且,很明显,它并不把阶级这一术语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雇工和平民可被称为“阶级”,那么理所当然地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一个新“阶级”。<sup>58</sup>

关于“论题”,我在标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意在亮出一种论点或澄清重要的争议。“论题”的提出是针对一种包容性的讨论,激发讲话者澄清其论点,以便在思想论争的混乱局面中不被曲解。

所以,论题的“长处”在于它通过重点指出某些思想传统的涵义,进而有助于在知识界形成讨论。这些论题的目标是去把握意义的明晰性,这是论证的必要前提。但是,明晰性常常并非是靠好的观点,而是靠贫乏的观点,以及模糊的复杂细节,来观察主要结构。因此,以下论题中的内容安排采用了讨论式的结构顺序。

## 论题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足

所谓的“徘徊在欧洲大陆”的幽灵是一种幻觉。宣称现代阶级斗争中的中心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幻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它基本上看来是不充分的。

第一个不足之处 19世纪相继发生的革命斗争中牵涉的农民与无产阶级同样多,甚至更多。中国革命显然如此,苏联革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彼得格勒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量大都是那些憎恨战争,渴求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他们推翻了沙皇政府,发动了十月革命;主要是那些关心去保卫其新获得土地的农民构成了挫败反革命势力的红军的核心。实际上,斯大林主义(杂碎)的根源在于依靠一小部分旨在控制广大农民的城市精英来欺骗农民,并使他们失望。

第二个不足之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从未能够说明自身,说明那些创建此学说的人,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与其假设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相适应的情况呢?当这一问题被提出之时,只有一种被沉默遮掩的尴尬。(人们一般不去问电视观众:“摄影师该何去何从?”)是的,存在着资产阶级,是的,存在着无产阶级,是的,他们还常常彼此争斗。但这些并不是在19世纪推翻了政府的革命的那种决定性的阶级斗争。不过在此我关心的是那些赢得国家政权并用之去实现大量的财产转移——集体化——的革命。

## 论题二 :农民与先锋队

因为对这些革命来说,所必需的是:(一)旧的国家的镇压机器——军队与警察的削弱,往往是通过外国军队对其军事力量的打击造成的;(二)社会的旧统治阶级常常因为不能确保免受外来侵略与剥削而削弱其存在的合法性;(三)反叛的农民部分地因其经济地位而异化;(四)知识分子的异化;(五)新组织“先锋队”的出现,它成功地使自己在国家统一运动和抵抗外来侵略上获得认同;(六)在出现这些革命的地方,外国政府不愿或不能帮助陷入困境的旧政权。

农民的异化在现代任何地方都未能推翻一个政府并实现大量的财产转移,除非他们与知识分子联合,并确实处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化指导之下。

知识分子与农民和其他群众的关系的中介,是被当作“先锋队”的新型组织。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

这些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角色的论述对何种革命适用呢?主要是对成功的革命。因为我关心的是区分成功的革命与失败的革命。成功的革命是那些:(一)旧的国家机器被摧毁(尤其是镇压机器),取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二)出现大量的财产转移。这两者是相联系的。因为如果不首先摧毁保护旧阶级的国家机器,大量的财产转移,剥夺强大的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在此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因为财产转移而使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得到加强的革命。换句话说,我的论述并不是要应用于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落入私人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外,我所提到的是以私有财产集体化的方式实现财产转移,使国家支配的生产资料增多的革命。首先,资产阶级革命,使权力从土地控制者手中转移到资本投资股票的所有者手中;其次,集体化的革命,使权力从那些收入来自货币投资或地产的人手中转移到拥有“人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即那些拥有相对先进教育水平的人手中。<sup>10</sup>

### 论题三 :有形的与无形的新阶级

猿猿在以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革命政治中,新阶级成员的有形的领导角色与运动中强调的民粹主义、平等主义或公社制不一样。因而在具有革命性质的运动中存在着压力,要对新阶级在其中的重要性进行掩饰、忽视、否认或歪曲。新阶级在革命政治中一直是一个无形的阶级,排除对新阶级革命作用的压制,并促使公众明了正是批判理论与批判理论家的特殊工作在起作用。

猿猿发达工业社会中,新阶级不但有时在政治上进行革命,而且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新阶级作为技术知识分子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工作服从于旧的有产阶级。新阶级对旧阶级履行技术服务,并且使社会的现代性、科学性合法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新阶级可以具有一种开放的、公开的存在形式,它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的作用也可以被承认。在这里它不必是无形的了。

猿猿新阶级接受了它在发达经济中的从属角色,主要是由于(并且在此范围内)这与它的物质与精神利益不矛盾。简言之,这与它得到的特许的生活方式及其追求自身技术利益的能力并行不悖。

猿猿在西方,由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会以多种方式,包括谈判与对抗,谋求其物质与精神上的阶级利益。像其他从属阶级一样,新阶级得不到它想得到的或它相信应该得到的一切,它抗拒自己的从属地位,并试图谋求更好的地位。

猿猿然而,新阶级追求自身地位的提高,克服(有产的)旧阶级抵抗的能力,比其他从属阶级强大得多。这是因为它具有生产力与管理方式方面的技术知识,对生产方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实际控制,从而有了谋求其利益的可观实力。新、旧阶级在控制生产和管理机器上展开了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生产工具具有合法所有权的阶级,与拥有技术知识并日益有效支配生产方式的阶级之间的一场较量。

猿猿许多反复出现的证据表明,那些拥有很大权力却没有相应财产的经理们,正慢慢地将旧的有产阶级置于历史货架上。然而,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对所有权与管理权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的研究非常明显。莫里斯·蔡特林对这一证据作了出色的批判性评论,他声明自己“不提供任何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他的最终结论基本上是方法论的和“否定的”：“……在最大公司中缺乏对财产利益的控制决不是‘不成问题的’、‘无可争辩的’、‘单独的’、‘关键的’社会‘事实’。”<sup>[1]</sup>

然而,蔡特林承认,专家认可的观点是:所有权实际上已经成为被动性的,而控制权则落入了专业管理者的手中,没有所有权的经理们正在取代有产的资本家。蔡特林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后卫式的行动。他正确地评论道,伯尔与米恩斯在其统计分析中给出的详细的鉴定常常在观察中被忽略,并且其他人过于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研究不加限定地为管理者控制的观点提供了材料。蔡特林总结道:“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只允许他们把 国家最大公司中的 明确地划归到管理者的控制之下。”

然而人们疑惑为什么蔡特林说“只”,尤其是因为这里指出的管理者控制的程度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前,即 年时候的事。大公司的管理者控制的程度何为“多”?何为“少”?更好的回答仍是:关于管理者控制的重要性不在于某一时期程度的多少,而在于长期的趋势。在长

时期内,管理者控制的程度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是增长了还是衰退了?即使管理者在某一时期只控制了少数大公司,如果这种控制不断增加,其意义也非同小可。

那么,对我自己来说,问题不是蔡特林所问的那个问题,即,是否“大公司(现在)实际上都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我的兴趣在于正在变化的事实。

蔡特林引证了菲利普·伯奇(Philip Barbour)于1954年这一时段的研究。这项研究断定,国家最大工业公司中的“可能”处于管理者控制之下,而最大的跨国公司中的“可能”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把管理者控制的特征描述为“可能的”,当然不会减少这些发现的力量。相比之下,伯奇的那种跨国公司最大的工业公司“可能”处于家族控制之下的类似论述则削弱了私有制的重要性。这两种“可能性”彼此抵消——这是可能的。在最大的跨国公司工业公司中,家族控制超过管理者控制的缘故,这一点并不重要。需要再次重申的是,重要的考虑在于发展趋势:管理者控制是衰退了还是增长了?家族控制是衰退了还是增长了?尽管难以得到精确的历史证据,但从长期的趋势看来是清晰的。甚至从蔡特林自己引证的剖析资料来看,很明显,管理者控制已不再是少数情况。

看来没人相信,基于苏联宪法对苏联的生产资料由苏联公民共有规定,我们就能够知道谁实际控制了苏联工业,谁从中获利。就苏联而言,人们已广泛承认,合法的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对工人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然而,在考察处于晚期资本主义阶级的美国时,决定所有权的作用却要花相当多的精力。“左派”告诉我们,尽管在考虑到苏联工业时,他们愈来愈怀疑所有权所意味着的许多东西,但在美国,所有权仍然意味着很多东西。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们通过投资其养老金,正在逐步买断生产资料,从而出现了一种“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左派用相当有力的理由对此作出了回答:“尽管养老金可能为工会所有,它们仍然是通过大银行与投资机构来管理的。工会把其养老金交付银行,银行反过来把钱投资于股票。所以是银行,而不是工会控制了股票权。”<sup>[1]</sup>因此,对一些人而言,当他们认为投资由工会所进行时,重要之处在于即使工会拥有投资,它们也不能控制这些投资,而当他们认为投资由资本家所进行时,重要之处则在于他们拥有这些投资。毫无疑问,两者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趋势。没有财产的管理者的控制会增长吗?这是一个问题。认为长期的趋势有利于专业管理者的观点将与我们的论点一致。

我们不该问新阶级目前的影响力有多大,而应该问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如何增长,与此相似,我们也应该经常问,这些影响力是在哪些机构,通过哪些决定来实现的?例如,随着军队武器逐步技术化、科学化,某些类型的新阶级在世界的军事力量中的分量是否正在逐步增加?这些新的将军是否心甘情愿地做“权力的奴仆”呢?还有,为了继续考察克里斯托弗·拉什(Crispin Ash)的论点<sup>[2]</sup>,很明显,从事“辅助”职业的新阶级正逐步扩大它对福利、教育、生活方式、家庭中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同样的,如果旧阶级仍然维持他们从前对这些领域的控制,为什么会有像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这样的评论家对于报刊和其他媒体对政府的敌视不满呢?在教育发展中,旧阶级作为国家的代表如何才能对大学行使同样的支配权呢?

从历史上看,在日益不同的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决策能力的僭取越来越多。当新阶级以理性的名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潜在政治霸权的服务者,通过批判传统的规范体系(如伏尔泰和狄

德罗)而开始起家之时,他们硬是断言自己不仅具有行政决策的权能而且最终甚至扮演了当代社会之规范体系的评判者与管理者的角色。于尔根·哈贝马斯(见《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复兴的观点正是要提出后一项主张。<sup>[1]</sup>

新阶级现在是统治阶级吗?当然不是。新阶级将于某日成为统治阶级吗?可能。如果他们正走在通往统治的路上,那么,是什么使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但人们为什么认为时间“漫长”呢?

旧阶级逐步取得权力花了多长时间?也许自19世纪起,随着城市化和“宗教”权力的衰落,这种权力的获取就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在1913年革命之前,大约花了四个世纪的时间。新阶级尚未达到它的成年期。实际上,它只是在近期才开始重塑自己。正如表员所表明,直至1913—1914年,新阶级才在美国经历了它的“起飞期”。

表 员新阶级在美国的“起飞”期  
新阶级的人口(除总人口以百万计,其余以千计算)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工程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经理(制造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社会、娱乐、宗教(不包括牧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大学教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会计师、审计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政府官员、公务员、监察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编辑、记者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总人口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摇摇资料来源:巴巴拉·艾伦瑞克(见《法兰克福学派》)和约翰·艾伦瑞克(见《法兰克福学派》)：“专业管理阶层”载《激进的美国》(1913年10月),第100页。

## 论题四 :竞争的舞台

源 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亮相,直到伍德罗·威尔逊(宰)执政以及随后他们卷入社会主义与进步运动才似乎有了重要的意义。在“黑幕揭发”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异化不断加深的迹象。由于年代的大萧条和反战反法西斯主义运动,这种异化进一步加深。麦卡锡主义也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异化和政治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段时期之后,他们倾向于在全国选举中培养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包括艾德莱·史蒂文森、尤金·麦卡锡、休伯特·汉弗莱和乔治·麦戈文。如果说美国的新阶级在推举候选人上尚未成功,至少它有明显的力量使一位总统林登·约翰逊下台。约翰·加尔布雷思注意到,迫使约翰逊退休的,不是工会、新闻界或商界,而是领导了反越战运动的大学。

人文知识分子(区别于技术知识分子)在美国具有明显的党派偏向。他们由于讨厌共和党,偏爱民主党而联合起来。查尔斯·卡杜辛和他的助手们已经留意到,这一点对他们中的舆论领袖尤为适用:“几乎所有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投民主党的票。”

源 在公共论争的水平上,新旧阶级之间的竞争存在于不同的舞台中:(员)学术自由已是一个重提的话题。为此,学会会员与大学董事会的旧阶级成员彼此争议不休。(圆)自从“黑幕揭发”以来,保护“消费者”权利已经成为新阶级用来“痛斥”旧阶级的一个话题。(猿)让人意外的是,甚至科学管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批评商业系统内部的浪费与商业不愿采用最有效方法的手段。(源)那种在公共政策的发展中采用“智囊团”和专家的倾向,不但有利于限制旧阶级对政府的影响,也有利于限制它所利用的政治机器的影响。(缘)一种“独立的”公民服务机构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含义。(远)寻求“政府中的诚实”的改革运动是新阶级反对旧阶级的一种常用手段,反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其政治偏好付钱的做法。(苑)新的世界生态运动与它对原材料和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的批判只是新阶级反对旧阶级的游击战中最新的策略。(愿)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表达了普通妇女对压迫的反抗,而且成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在新阶级中谋求充分权利的一种要求。

源 新阶级的影响不仅延伸至生产管理,也延伸至资本投资。旧的投资阶级逐渐转变成一个拥有特权但毫无作用的地位集团,转变成一个在生产与管理方面毫无作用的“贵族”。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逐步地把旧阶级转变为一个食利阶级,转变为靠自身的利润、租金和利息生活的领取养老金的人,或转变为通过吸收新阶级的特点而重组其阶级性质的阶级。

源 在缺少阻碍的情况下,新阶级也许会困扰旧阶级,损害它、批判它、揭发和暴露它的缺陷,对它显示出更高层次的道德、技术和文化水平,对它公开加以轻视和嘲笑。然而,新阶级并不为了斗争而斗争。没有一个阶级会这么做。它所关心的仅是以最小的努力来保障其物质和精神利益。阶级斗争仅仅是新阶级追求其利益的众多演出剧目中的一个小节目。没有一个阶级会在没有事先看到谈判或威胁能产生保障之前就诉诸战争。

源 新阶级的一个基本的阶级策略是要培育与广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同盟,加剧大众与旧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指导同盟反对旧阶级及其在旧社会秩序中的统治地位。

源爱福“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新阶级的政治策略。两者间本质的不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阶级的统治更充分，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更多。在福利国家中，(葬新旧阶级彼此相互制约，并且(遭共同控制工人阶级，尽管(糟新阶级可能有时同工人阶级结盟反对旧阶级以改善自身所处的地位。

